

以俄為鑒看中國

- 羅伯特·昂格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 崔之元

一 西方資本主義是唯一模式嗎？

當人們想到蘇聯的瓦解，腦海中便會浮現出一幅圖象。在這幅圖象裏，現代社會是沿着市場經濟和指令經濟兩條不同的道路發展的。走指令經濟道路的國家作了錯誤的選擇，因此嚐受經濟失敗的苦果。他們現在必須回到分叉路口，重新再走另一條路。雖然這種過渡代價高昂，而且受到因此而將有所得者和將有所失者間的衝突所纏繞，但要走一條新路卻是無庸置疑的。

許多西方人和中國人都相信，中國減低了這種必然過渡所引起的最壞影響。她很早就在經濟上放權，為私人企業、個人或地方提供了發展的空間。而她刻下要做的，就是在繼續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亦要保持政治穩定，以免造成地方混亂和社會衝突。

然而，這種看法的前提卻是頗成問題的。它使人有一種錯覺，就是一般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後共產主義社會，都朝一個相同且明確的目標前進，問題只在於前進時間的長短：由此出現了與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相對的漸進主義(gradualism)詞彙。這個詞彙的重點，就是認為任何形式的制度改革，都能逐步地取得成果。可是它有個致命的盲點，就是低估了在國家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點——國家的未來可以有多種的可能性。

「制度拜物教」(institutional fetishism)既激活了漸進主義和震盪療法等術語，也使這類術語不甚了了。「制度拜物教」誤認為，抽象的制度概念，如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政治，是備有固有和必然的形式，亦即是發達工業國家所建立的那一套形式。而事實卻是，建立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政治可以有許多不同方式。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有她們獨特和可變的體制安排。只要從各種經濟和政治思想的決定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我們就可以明白現存的各式市場經濟

俄羅斯現在的遭遇和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顯示，這些國家不能單靠模仿工業發達的民主國家的政經制度來達到富強和自由。她們要成功，就必須開創不同的制度。

和民主政治的體制結構，只不過是可能出現的形式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些不明此理的人，最終會將極權或殖民統治視為國家不可避免的命運。

精英的自身利益和人們對精英的盲從，構成今天在政治和經濟民主中為大眾謀利的棘手障礙，也由此影響國家獨立的追求。俄羅斯現在的遭遇和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顯示，這些國家不能單靠模仿工業發達的民主國家的政經制度來達到富強和自由。她們要成功，就必須開創不同的制度。對目前俄羅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境遇有確切的瞭解和判斷，將為開創新的體制帶來啟迪。

二 俄國的紊亂說明了甚麼？

讓我們先看看正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俄羅斯人面對着的，是一個無法成功的選擇。一方面，那裏充斥着一種由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西方政府和許多周遊列國的技术官僚支持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倡行嚴格的金融法規、西方式的個人財產權和全面開放國內經濟俾使國外資金得以滲入等政策。實行這些計劃所付出的代價是生產方面的災難性銳減，新自由主義者對這種情況高興不已，因為他們揶揄過往大部分生產系統是「減值」的，意謂它所消耗的資源比它生產的還要多。另一方面，在現存生產系統內的既得利益者，卻為自身的利益進行反抗。俄羅斯人民並沒有得到真正受大眾歡迎的工業重建計劃和真正的民主化市場經濟方式。

這樣一種民主化工業重建的替代方法，是不可能從書本或是官僚和學者的計劃中得到。它必須由有組織的社會和公民的主動參與而產生，並得到政治體

由於俄羅斯在經濟政策上的失誤，導致問題叢生，中國實可引以為鑑。



制支持，從而提升民眾政治行動的層次；此外，亦需要有在政府架構以外能令市民社會組織起來的社會機制。這些都是國家重建不可或缺的條件。但俄羅斯的新自由主義者和他們的西方支持者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這種體制是奢侈的玩意，並非處於國家重建期的俄羅斯所能夠負擔的。結果，新自由主義和西化的計劃變成一個自我應驗的預言：一個紊亂的社會無法自我重建。

三 制度創新的三方面啟示

俄羅斯和中國處於不同的環境下，亦各有不同的前景，她們從何處尋找發展解決之道的啟示，以代替正給俄羅斯帶來災難的計劃，和在中國常被認為是邁向市場經濟必經之路的改良式漸進主義方式？

這裏有三個啟示的來源：

第一，西方強國驕人的經濟成就的經驗。美國經濟成功的根基在於農業，後來才以工業為主。像許多成功的西方經濟國家一樣，美國的農業自十九世紀中葉起，便建基在美國政府和個體農戶之間的夥伴關係上。政府不但提供土地，還幫忙控制市價、分配肥料與機器，亦掌管買賣。而西方最先進的區域經濟體系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這種政府和私人生產者之間成功的夥伴關係模式推展到整個經濟領域去。

第二個啟示的來源，是緊隨日本步伐的「亞洲四小龍」中——南韓、台灣、新加坡的經驗。這些國家與同樣發展，但卻不能取得相同成果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分別是：第一，她們推廣平等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和大規模投資在國民教育上；第二，她們謹慎控制國外資金流入，因而把跨國企業納入國家發展計劃的控制之下；第三，她們是推行成功的政府和商界夥伴關係的先驅。但這種夥伴關係的體制存在着一個問題，就是統籌工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部門，常常淪為官商精英勾結的機構。官僚任意妄為的結果是導致重大的錯誤，因精英的利益而犧牲大眾的利益。當務之急是重整這種夥伴關係，使它成為一個更分權化、更具實驗主義精神和更加民主的模式。例如以一些得到國家支持、在財政上受嚴格控制和肩負社會責任的公私混合體，來代替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讓它們在國家各地區和各經濟領域內競爭，在組織生產和商業上力求進取。這些社會基金和合作網絡應由工人、地方政府和社會組織共同監管。

第三個啟示，來自工業民主國家最成功的區域經濟體系（如意大利北部、加泰羅尼亞、丹麥、德國西南部和美國中西部某些地方）出現的合作式競爭體制。中小型企業或是大型企業中的細分部門，同時互相競爭和合作，集合財務、商業和科技資源。競爭和合作的結合，集分權化進取精神和大規模企業兩者的優點於一身。更廣泛的說，它有助創造一個利於加快學習的環境，在這環境中，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落差被削減。

維持經濟增長的集體力量的核心，是革新與合作之間緊張、困難重重和賦

新自由主義思想倡行嚴格的金融法規、西方式的個人財產權和全面開放國內經濟俾使國外資金得以滲入等政策。實行這些計劃所付出的代價是生產方面的災難性銳減，結果，新自由主義和西化的計劃變成一個自我應驗的預言：一個紊亂的社會無法自我重建。

予成功的關係。不斷的革新，無論是在組織上或是在技巧和科技上的革新，都需要生產上的團隊合作和各級社會管治的共同協力。然而，合作亦會危害革新的力量，特別是當它淪為既有權利的系統，挾持着具有生產效益的機會以獲取狹隘的利益。在經濟增長策略中一個根本和不變的問題是：尋找能把成本降到最低而又能產生最大利潤的合作體制方式，以及從合作至革新的體制方式。具有合作式競爭特點的區域經濟體系正合乎這種條件，其成果尤為豐碩。

然而，這些後福特主義的經濟(postfordist economies)一般是依賴在前福特主義的條件上，亦即是技術勞工的長期發展傳統和密集的社群生活網絡，把種種類別不同的「私人」組織與強有力的地方政府結合起來。意大利北部的區域經濟提供了典型的例子。可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化國家，大多欠缺這類背景條件。那就必須通過政治構想去發展，並通過政治行動去建立一個與前福特主義條件功能相當的背景，以供後福特主義經濟使用。這個相當的條件應包括大量的教育投資，和在實際社會生活的各環節中優先提供有利獨立集合組織的政經安排。

我們提出的這三個民主化發展策略和民主化市場經濟的起始點，都需要一些在政府和企業之間作中介的組織，如社會基金會和發展銀行。這些中介組織能夠，也應當向跟它們打交道的企業和社群，以及使之得以運作的政府負責。它們在決策上應擁有相當的獨立性，亦應互相競爭和冒倒閉的風險。到了後期，這些體制的創設可能還需要發展一套新的財產體系以作替代，使本來包括在傳統的統一財產權中的權力分解出來，並將之重新分配到不同階層的持權人手中。這樣一來，民主政府、社會基金、地方政府、企業和工人都可監管由他們所創造的生產資源和所得收入。

中國的改革已走在多方共享所有制的道路上，把傳統西方式財產權所包括的部分分散給不同的持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有制，傳統上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瓜分的。自從1978年起，中國改革在漸進的發展中，大幅擴闊了持權人的範圍。像蔣一葦的經濟民主理論構想，正代表對這種經驗的計劃性反思的開端。

四 中國的制度創新優勢

綜合這些不同啟示的來源，是要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大國找出一條康莊大道。中國可能比同類的國家要窮，而且在國家民主化重建的問題上仍然困難重重，但她卻擁有一個決定性的優勢，就是她可憑藉結合公私進取精神、社會和私人所有權、工農業、先進和原始科技的一系列革新。

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經驗指引出一個方向，就是把企業間既競爭又合作，且能集中財務、商業、科技資源的合作式競爭體系，跟政府和商界、公共部門或社會組織和私人生產者之間的夥伴關係連合起來。私人生產者的合作式競爭

網絡應為地方和區域政府的夥伴。這種夥伴關係應透過公共和私人的混合基金、銀行和科技中心來運作。這些機構應擁有相當的獨立自主，在財政上受法規的嚴格控制，亦應互相競爭。在享有獨立的同時，它們應同時向凌駕其上的民主政府，及居於其下的企業和工人負責。中央和地方政府、社會組織、工人應共同擁有它們。

在經濟活動的領域裏，這種架構賦予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構思和民主實驗主義實際的意義。同時，它給科技先進者(technological vanguard)和科技後進者(technological rearguard)之間的同盟提供制度上最有利的基礎。科技先進者按科技後進者的需要生產輸入品和機器，使後進者能根據自己科技吸收能力的大小來加以吸收。如果中國的分權化製造活動得到這種先進者的供應，就能逐漸轉型。先進者和後進者共同學習。學習和合作的相互結合，是成功和持久的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要害，這對那種融合普遍民主和國家和諧的增長類型尤為重要。

發展這種同盟的基本條件，是把經濟中負責發展先進者和聯合後進者的部分，從短期主義(想在短時間內獲取利潤)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先進者和後進者的夥伴關係能帶給雙方豐碩的經濟成果，但這不是一蹴即至的。正是為了這個原因，所以就需要一個我們曾提及過的，能夠規劃和實行長期策略，並能確認共同利益和機會的體制架構。

除此以外，先進者和後進者的同盟，還對持續和民主化的國家建設策略有決定性的貢獻。第一，它掃除了選擇資金密集和勞力密集式生產的兩分法的謬誤，因為資金密集的先進者可以替勞力密集的後進者生產。第二，它防止內部二元經濟的出現，在這種二元經濟下，經濟和社會被分裂成兩個體系，一個是得到資金、科技和政府幫助；另一個則淪為後備勞工大軍和剩餘消費者的市場。無法防止或克服這種二元經濟，會對國家造成毀滅性影響，巴西和墨西哥就是明證。而今天，新自由主義者和西化計劃正在俄羅斯製造這種毀滅性的二元論。第三，先進者和後進者間的夥伴關係，將能幫助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跳出新世界經濟為她們預備的惡運——把她們作為過時的福特主義式工業的收容所，就是用半熟練工人操作僵化、欠缺靈活的機器和生產程序，大量生產標準化商品。這種陳舊和二世的福特主義，只有在不斷壓低工資的情況下才能維持競爭力，這樣會令國家經濟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夾在全世界最低工資的生產國和先進生產國之間，進退維谷。最重要的是，會將經濟發展的中心——集體學習和革新的過程拖慢。當俄羅斯的經濟正在變成二元性(或是轉變她早就存在的二元性特質)，它亦越來越陷進晚期福特主義附庸和赤貧地位的泥淖裏。現在，中國和俄羅斯一同被邀請去參與世界經濟的事務，對中國來說，除了民主政治之外，沒有其他東西比防止二元經濟和擺脫晚期福特主義的角色更重要。

這些建議是從中國的「兩條腿走路」工業政策找到起始點的。這種工業政策最先在1958年由毛澤東提出，自1978年起，通過農村的工業分包商和城市裏先

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經驗是把企業間既競爭又合作，且能集中財務、商業、科技資源的合作式競爭體系，跟政府和商界、公共部門或社會組織和私人生產者之間的夥伴關係連合起來。這些機構在享有獨立的同時，亦應向凌駕其上的民主政府，及居於其下的企業和工人負責。中央和地方政府、社會組織、工人應共同擁有它們。



在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的國營企業的合作而發展起來。這種獨特的合作同盟，把經濟先進者和後進者之間必需的夥伴關係，變為大眾接受和民主的經濟增長策略。這有助防止形成拉丁美洲式的二元體系，把經濟和社會分裂成受厚待和受冷落的兩個涇渭分明的部分。它也有助避免了「價格剪刀差」(price scissor)機制，這機制曾帶給蘇維埃式工業化過程和蘇維埃政權不幸的下場。

在「價格剪刀差」制度下，中央政府壓抑農產品價格，促使農民轉投工業，迫使農業補貼工業。在這種政策下，斯大林於1927至1928年蘇聯發生了糧食危機後，終於在1938年取消了他曾不顧農民的死活、迫使他們投入的集體農場經營的農村工業。他在農村工業中正確辨認出農民得以避免價格剪刀差的路線來。然而，被蘇聯棄如敝屣的農村工業，卻成為中國發展策略的中心環節。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堅持「人民公社必須搞農村工業」。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劉少奇把農村公社經營的農村工業揚棄，但是，當毛澤東在1970年提倡農業機械化後，許多這類公社經營的農村工業又再出現。農村企業最近發展的「股份合作」制，是科學研究機關和城鄉工業之間更靈活的合作形式的開端。

以上列舉的每一個替代發展策略，包括把政府和個體農場間的合作形式推展至整個經濟裏、企業間的合作式競爭體系、亞洲四小龍式政府與私人生產者之間夥伴關係的實驗主義式分權化、先進者和後進者的聯合，都可從現今中國經驗中找到施行的材料。

如果這些材料能在一個一貫的發展策略中施行，就能令中國跳出世界經濟中晚期福特主義的囚籠，免於陷入競爭能力受生產要素條件制肘的泥淖中。如果中國聽信西方保守自由派的經濟學者，像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等多邊

經濟組織，以及西方列強的建議，她將會僅僅是善用現有的優點和缺點：發展大量廉價勞工和某些豐富的天然資源蘊藏，結果是大部分的勞動力將投入到傳統的、低技術的福特主義式大量生產，以作外銷和國內消費，而餘下的人則大多繼續從事糧食生產以供國家使用。如此一來，中國將默默扮演正統經濟理論分派給她的角色，就是發展比較工資低廉和技術落後的福特主義，而這恰恰是先進經濟國家正在努力擺脫的。

這種不合時宜的福特主義會妨礙先進者和後進者的互惠合作，因為大批量生產的工業最適合複製標準化消費品，而不是按照農業和「次等」、未發展經濟體系的製造業的需要，來生產有助它們進步的輸入品和機器。這種經濟發展的基礎，只能為小部分勞動人口提供就業機會，而剩下的勞動力只好被迫到一個資金困乏的次等經濟裏。這使得外銷的競爭能力受制於工資的壓抑，雖然在大批量生產線工作的工人比起其他的勞動人口有較優厚的待遇，但由於工廠比較落後，亦因此要付出工資和消費力受嚴重限制的代價。因為這種原因，接受晚期福特主義為經濟演進過程不可逾越的階段，將引來僵化的二元體制，而中國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她正設法從這困局掙脫出來。逃離這種惡運的方法，是在制訂經濟計劃前，先制訂好政治計劃。

五 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應該齊頭並進

政治帶動經濟。我們在前面所倡導的策略，需要一個強勢的政府(hard state)來規劃和實行一些不受經濟精英利益左右的政策。除了提倡平等改革(在冷戰時期的敵對情形下)和大量投資公共教育的優點外，亞洲四小龍比起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國家更為優越的條件，就是她們擁有這種強勢的政府。蘇聯自從勃列日涅夫時代起就成為一個弱勢政府，儘管俄羅斯擁有超戴高樂主義式(hyper-Gaullist)憲法，仍然無法扭轉乾坤。另一方面，那些要推行任何改革(即使是新自由主義和國際貨幣基金會那些執迷不悟的改革)的拉丁美洲國家，則全靠成為更強勢的政府才做到了。如智利，須靠軍事獨裁和中間路線者的共識；阿根廷，靠的是政治出賣和授權強硬的技術官僚；墨西哥，則倚仗被認為是開明的技術官僚的聖西門主義式(Saint-Simonian)專政，更加依靠選舉舞弊而不是以往的經濟附屬主義(economic clientelism)。這些都是最好的說明。

像曾盛行於亞洲四小龍的政治威權主義，是形成強勢政府的捷徑。然而，這條捷徑既危險又代價高昂，且勢必造成政治官僚和經濟精英的勾結，這減弱了政府的強勢程度，又以經濟進步為禁嚮，用來替那些與精英有交易的人謀利。當要求民主的壓力升高，而必須向民主的渴望作出讓步時，半民主化的強勢政府就軟化下來，直至它急進推行民主政制和公民社會，更全備的自我組織才能再度強化起來。

多元經濟和多元政治是有關連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受「制度拜物教」所誤

如果中國聽信西方保守自由派的經濟學者，以及西方列強的建議，她將會把大部分的勞動力投入到傳統的、低技術的福特主義式大量生產，以作外銷和國內消費，而餘下的人則大多繼續從事糧食生產以供國家使用。而這恰恰是先進經濟國家正在努力擺脫的。

導，以為這種關連是民主政制和習慣上稱為「資本主義」的西方式主流體制之間的必然關係。正當現在中國的改革產生了大量的非正統市場體制，中國的當代史亦包括了體制革新的片段，這是在全新的體制形式中結合直接和代議式民主政制。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運動中，位於邊境的陝甘寧地區，在1937年成為現代中國第一個以競逐方式直接選舉官員的地方政府。這種經驗，在1988年6月起中國27個省舉行的鄉鎮領導選舉中，繼續產生共鳴。

政府精英對多元政黨政治的專制鎮壓，限制了這些雛型民主經驗的範圍和原創性。除此以外，這些日益腐化和沉淪的精英分子，在戀棧權力和意圖把公職變為私人特權的事情上，表明他們傾向一些更傳統的市場資本主義方式。貪婪的商人和暴君沆瀣一氣，在中外歷史皆然。官員迫不及待要把他們填滿私人聚寶盆的意圖，輕易地隱藏在傳統財產權的屏障之後。一個照顧到工人、社會組織和地方政府利益的全面財產和生產結構，很難和政治威權主義並行不悖。因為前者在組織生產時，實際上促進了市民社會的自我組織和減輕管理和執行間的緊張。

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政制和市場經濟的民主化形式，往往招致一個常見的反對：在人民的教育程度未獲普遍提高的情況下，要在國家大部分地區實行民主政制，那只會造成混亂。政治鎮壓變成對付暴亂的天賜良方。可是，這種偏見是從類似「制度拜物教」的迷信而來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各種體制形式，無論在性質或內容方面都不相同，換言之，它們在範圍和程度上是可作變更修改的，而不是建基在「要就要，不要就拉倒」(take-it-or-leave-it)的原則上。

大眾政治動員和明確的體制規則，並不是像保守政治科學所說般對立的。反之，各種體制在鼓勵參與和消弭衝突的程度上都有不同，亦有自己一套的修正方式。一個國家必須經常進行改革，以促進經濟增長、令人民和諧相處和更新體制。她必須接受改革為正常的是和平生活整體的一部分。一個反覆進行結構改變的政治，必然是一種高能量政治(high-energy politics)，它容許制度化的衝突和更廣泛的民眾參與。一個技術官僚的、威權主義的、低能量的政治(low-energy politics)，無法容忍不斷進行基本改革的政治活動，它亦無法提供經濟持續進步最有利的環境。當經濟發展時，把作為限制經濟增長的強制剩餘提取率(coercive surplus extraction)(儲蓄和投資的絕對程度)與恆定革新能力相比較，前者顯著失色。(比較史學研究指出，明清時代的中國比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享有更高的儲蓄率；急速成長的主要障礙，不是壓抑消費的不足，而是社會和技術革新的不足。)現在應做的事，是讓一種能摒除「不鎮壓便混亂」這謬誤的體制，在各種政治(國家政治、草根政治、理念的政治)中穩步貫徹。要能朝這方向邁進，就要深化民主政制。

深化民主意指發展一套能提高社會的政治動員程度的安排(例如，透過對政治活動的公共財政資助，和擴闊政黨和活動享用大眾傳播工具的權利)：發展一套把政府各部門間的僵局，通過全民投票和提早選舉，交由全體選民來迅

一個國家必須接受改革為正常的是和平生活整體的一部分。一個反覆進行結構改變的政治，必然是一種高能量政治，它容許制度化的衝突和更廣泛的民眾參與。現在應做的事，是摒除「不鎮壓便混亂」這謬誤的體制。

速解決的憲法安排：建立一套在國家機器以外（區域上或功能上來說）能使市民社會自我組織起來，並主動地參與集體討論和解決集體問題的社會體制。世界上的通則是：政治威權主義形成能幹但不安定的強勢政府；比較民主的政制（熱衷政治的精英分子、動員程度比較差和組織不平均的社會的民主）又軟化政府的強勢；而當社會更加徹底的進行民主化後，這種強勢將可以另一個更深入的形式再度出現。

於此，給中國的提示是很清晰的。如果不走上深化民主之路，中國將要在精英主義的、互相勾結式的強勢政府和軟化政府之間作抉擇，後者容許精英的利益和交易，以及公職變為私人特權，繼而並從政治威權主義中撤退。中國很早以前就開始這種撤退。現在她的領導者選擇這條路的必然後果，加上人民沒有獲得充分教育，主要是限制了她的經濟和社會革新的前景。像所有的撤退一樣，它隨時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殘局。對這種混亂的恐懼，正好成為緊抱着威權主義不放的藉口。

然而，中國人民的利益卻指向另一個方向。只有積極推行民主實驗主義（不是要在一夜之間做到，而是按步就班），才能使廣泛的經濟實驗主義在我們擬定的策略和體制中得以具體實現。只有這種實際的實驗主義能夠幫助中國，使她免於步今天俄羅斯的後塵，變成一個分裂和絕望的社會。

六 中國仍有選擇的餘地

現在中國的未來有兩個選擇。較平坦的一條路是把現在如農村工業和城鄉企業的改革，純粹視為向傳統個人財產權、自由放任的不平等和半民主化政府的必然過渡。這會是俄羅斯所走的路線的漸進主義版本，而俄羅斯人正在拼命地脫離這個深淵。

另一條道路是在她的特性和創造力的基礎上，進行經濟和政治的民主化革新，給予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一個比西方強國更積極的實驗主義形式。這一條解放國家和授權人民的道路已近在咫尺。但是，只有當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內的多數人決定去爭取財富，並瞭解到希望是行動的結果而非原因時，這條路才能被打開。

中國的未來有兩個選擇。一條路是把城鄉改革，純粹視為向傳統個人財產權、自由放任的不平等和半民主化政府的必然過渡。這會是俄羅斯所走的路線的漸進主義版本。另一條道路是進行經濟和政治的民主化革新，給予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一個比西方強國更積極的實驗主義形式。

林立偉 譯

羅伯特·昂格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

崔之元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